

兩岸學術交流之發展與評價 ——臺灣地區學者觀點的調查研究

陳 德 昇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 欽 春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臺灣地區之大陸研究學者對兩岸學術交流的看法與觀點。基本上，近十四年來兩岸交流發揮了促進相互瞭解、提升學術水準與分析視野以及影響決策之效果。儘管其成效仍屬有限，但是雙方持續推動學術交流的作法仍值得肯定。當前兩岸交流的主要障礙在於政治干預、官僚作風與程序繁瑣，以及雙方互信基礎脆弱。事實上，封閉與猜忌只會造成更多的誤解與不安，唯有溝通與互動，尤其是主動積極的回應才是化解兩岸僵局與危機的有效辦法。未來兩岸提升學術交流的品質、強化專業對口單位的交流以及決策智囊的對話，皆有助於鞏固互信與良性互動。

關鍵詞：學術交流、非機率抽樣、官僚作風、二元社群、策略管理

壹、前言

民國 76 年 11 月 2 日，政府開放大陸探親，開啟兩岸交流新頁。過去十四年來，兩岸學術界的互動與對話，發揮了促進雙方瞭解、提

升學術水準，以及影響決策之效果。其中尤以臺灣之大陸研究學者，以及大陸研究臺灣問題學者的雙邊交流最為密切，其研究成果與觀察分析，亦對兩岸決策產生一定的影響。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兩岸當前仍處於敵對狀態，雙方互信基礎脆弱，甚至連學術交流都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約。因此，如何突破當前兩岸的僵局、增強雙方的瞭解、避免對方的誤判，進而掌握兩岸關係發展的脈動，兩岸學術交流實扮演重要之角色。

本文主要採取文獻探討、問卷調查、深度訪談以及 SWOT 分析等方法進行研究。¹明顯地，在國內有關兩岸學術交流文獻中，對兩岸學術交流、運作與影響做全面之探討與分析十分有限，尤其是針對「臺灣研究」與「大陸研究」學門之交流運作與綜合評估，以及國內研究大陸問題學者與官員進行問卷調查分析，皆顯不足與欠缺。因此，本研究即試圖透過對兩岸學術交流的實證分析解讀其政策運作、功能與興革之道。

本研究調查對象主要為臺灣地區之「大陸研究學門」之學者，主要因為過去學界對大陸方面相關調查研究經驗顯示，開放性及申論性之題目其答案普遍出現異質性高且語多保留的結果，同時問卷分析顯示信度與效度也相當有限，故本研究並未針對大陸學人進行問卷訪查。此外，本研究的問卷設計上著重在結構型的安排，透過此項設計以及系統性的抽樣，以合適的切入點進行調查訪問，取得涵蓋性、精確度更高的集體資料，透過電腦統計的分析，完整地呈現臺灣學者專家在當前局勢下對於學術交流的政策認知、態度、績效以及相關的意見和政策建議。

本次調查研究之對象，主要是臺灣地區參與兩岸學術交流之學

1. 本文因篇幅限制，研究方法部分予以省略，如需詳盡資料，請見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委託筆者《兩岸學術交流：政策、績效與建議》研究計畫之結案報告。

者、專家。由於學者專家群體誠屬少數，且不似一般抽樣母群之分散與均勻之特質，加上樣本空間選取上相當受到地域、價值與文化上之限制，故以立意或判斷式抽樣法（purposive or judgment sampling）取代一般常見的隨機抽樣。因此，本研究採取非機率抽樣（non-probability sampling）的模式，在抽樣的對象上涵蓋地域、學門、政治以及文化的多元性，雖不能完全代表兩岸學術交流的實質內涵，但也足以反應當前交流的意義與問題癥結。根據上述原則，本問卷之研究對象針對臺灣地區之學者專家，區分為五項抽樣類別，各項樣本結構安排如下：1.大陸研究機構研究人員；2.大陸研究學科教授；3.大陸相關研究學門研究生；4.留美臺灣研究生（以大陸研究為主題）；5.大陸事務決策與事務官員。

本研究問卷設計完成後進行問卷試測，根據試測結果進行信度 Cronbach's α 的一致性檢定，並藉由結果修正問卷內容，以增加問卷精確性。在二個月的問卷調查時間，共計發出 280 份問卷，回收問卷總數為 238 份，刪除信度、效度不佳之問卷，實得有效問卷為 225 份。惟部分受訪者迴避或漏答部分問題，但整體問卷並無失當，顧及意見取得之不易與多元，故採統計方面「遺漏值」（missing data）處理方式，讓每份問卷的意見皆可彙整於整體統計數據之呈現。

貳、兩岸學術交流的意義與障礙

一、學術交流有助於兩岸相互瞭解

本研究對學術交流之發展與評價之分析結果顯示，受訪的學者專家認為兩岸學術交流有助相互瞭解（平均值 1.73），也傾向擴大交流之規模（平均值 1.71）然而在學術交流互動的現況及評價上卻顯示受訪者意見的落差（平均值 2.68 和 2.85），顯然在兩岸學術交流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以及實質的障礙。

同時，在此一部份的問卷題型中也以兩岸學術交流的管道、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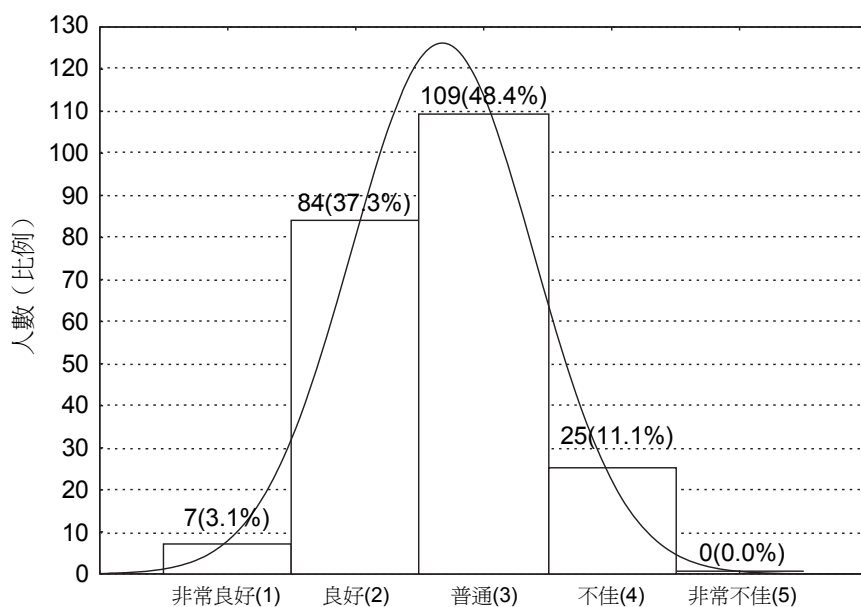
分配的公平性以及政治因素的影響等方面做一解析，試圖瞭解在學術交流方面不確定因素的可能來源。結果顯示在交流管道上差強人意（平均值 2.58 位於「普通」與「還算暢通」之間）；資源分配公平性上則意見紛歧，但是認為「不公平」的 30.1%顯然多出認為「還算公平」的 22.2%多出許多，顯示政府當局在有限的交流資源分配上似有不公；最後，在政治因素的干擾方面，高達 78.3%的受訪者認為兩岸學術交流「不可能」或「非常不可能」不受政治因素影響。

此外，在未來學術交流前景上，多數意見集中在審慎樂觀的態度（平均值 2.20，有 76.5%認為「還算樂觀」或「非常樂觀」），顯示雖然兩岸政治、軍事情勢低迷，但在學術交流中立、互惠特性中，兩岸學術交流的實質作用仍有可為。

政府在民國 76 年開放大陸探親以來，雙方互訪的人員日益增加，兩岸近四十年的隔閡與敵意，有待實質交流達成相互溝通與瞭解。從問卷結果之平均值 2.61 來看，乃介於「有些瞭解」與「普通」之間。近五成的受訪者認為是「有些瞭解」，二成八的受訪者持中立持平的看法，顯示國內大部分學者專家的認知是相當肯定交流有助相互瞭解；雖有一成七的受訪者認為目前雙方不太瞭解，但實際上在「非常不瞭解」的選項上並無人選填，表示並不強烈否定交流對相互瞭解的實質助益。同時，受訪者對交流產生的相互瞭解的結果普遍傾向中間偏向正面的看法；換言之，受訪者普遍認為交流有助於雙方彼此的瞭解。

問卷分析結果非常明顯地有高達九成一的受訪者認為學術交流有助兩岸彼此的瞭解；只有少數約 1.3%的受訪者是認為「沒有幫助」，在「非常沒有幫助」的選項中一樣沒有受訪者選填。平均值 1.72 介於「有些幫助」與「非常有幫助」之間，以及分配曲線朝向交流對瞭解有所助益的傾斜，以及峰度高狹顯現的意見集中性，代表受訪的絕大多數學者專家是肯定學術交流對兩岸相互瞭解的正面作用。

圖一 兩岸開放交流以來之學術交流互動情況



(有效人數 = 225 平均值 = 2.8 標準差 = 0.71)

從圖一可以明顯地看出，在學術交流雙方互動情況部分，四成八近半數的受訪者採中間不置可否的態度；但有四成四的受訪者則表示兩岸開放交流以來，在學術交流部分的互動是「良好」及「非常良好」之間的肯定態度，約有一成一的學者專家則持負面的看法，認為學術交流互動的狀況「不佳」，但在「非常不佳」的選項中則無人選答。

以平均數 2.68 審視之，落點位於中間偏佳的位置，特別在圖中的分配曲線中，以高狹的峰度顯示在此一問題呈現之態度的集中現象，也就是表示雙方在學術交流互動上審慎樂觀，這種差強人意的結果呈現出兩岸近年來之開放交流雖有成效但仍嫌不足，顯示未來在學術交

流方面仍有待加強。

在學術交流現況之評價上，分配曲線呈現鐘型偏左之分佈，代表在此議題上正反雙方的意見各自表述，除了四成三八的受訪者採中間保留的態度外，有三成五的學者專家認為「還算滿意」，且接近二倍於「不滿意」的人數，但以二成的受訪者表示「不滿意」和「非常不滿意」，明顯和前述在表達互動情況的不滿意傾向態度的比例多出許多。換言之，受訪的學者專家們認為在學術交流部分的互動情況所呈現的事實描述是差強人意，在交流現況的價值判斷上更是相當的保守。

綜合前述分析，很明顯地學術交流對產生相互的瞭解的正面作用是普受認同的；其次，在實際的互動情況則顯現尚屬滿意的看法；然而，在學術交流現況的評價上，平均值 2.85 雖仍有滿意傾向，但已相當接近中間值，顯示學者專家們普遍認為學術交流對雙方瞭解是具有相當正面的成效，對學術交流互動的情況卻傾向審慎的態度。最後在現況的價值評斷中，不滿意的比例卻增多了許多，這三者之間產生的落差也正是本研究與大多數從事兩岸交流或研究的人士，以及政府有關單位值得探究的部分。

二、政治因素對學術交流的干擾

以下分析係針對學術交流的實際面向做一初探，包括管道、資源以及政治因素方面，試圖整理出概念性的輪廓。首先在交流管道的評價上，五成五受訪者的選擇是在「還算暢通」和「非常暢通」之間，排除三成一四的中間態度受訪者，顯然比一成三六的「不暢通」和「非常不暢通」的比例多出四倍，顯示就當前學術交流的管道而言尚屬暢通。2.58 的平均值顯示一般多數意見是位於「還算暢通」和「非常暢通」之間，且在兩方的極端值也只有極少數的百分比，顯示在此意見頗為集中。

在政府對學術交流資源分配公平性的評價上，意見屬於較為集中的常態分配，除了四成三的受訪者態度持平保留外，正反雙方的意見各有立場，顯然認為不公平意見的比例三成三多於認為公平的三成一。換言之，雖然在此議題學者專家的意見多所分歧，但是認為政府在兩岸學術交流的政策執行上，在掌握有限資源的分配上，顯然受訪者認為不公平的現象是較為明顯。至於，政府資源的分配的現況是如何？以及為何三成多的學者專家認為不公平，或許是政府與學界值得深思的問題。

本題受訪者意見分佈出現相當分散與比例懸殊的落差。七成八三的受訪者認為兩岸學術交流「不可能」或「非常不可能」不受政治因素的影響；相較於問卷中對立的選項，也只是一成四認為「有可能」或「非常有可能」不受政治因素的影響，比例上落差相當懸殊。一般解讀上除了少數受訪者樂觀認為政治因素應不構成兩岸學術交流的干擾變數，但事實上絕大多數卻以明顯的意見集中度指陳：政治因素仍為當前兩岸從事學術交流最重要的變數之一。平均數 3.74 在此分歧的意見分佈中，其標準差應有較大的誤差，但是以圖二，「不可能」選項以六成五六鶴立雞群的分配態勢，位於接近「不可能」的意見仍是學者專家意見的集中區域。

圖二 兩岸學術交流能否不受政治因素影響



(有效人數 = 221 平均值 = 3.74 標準差 = 0.92)

三、學術交流衍生之問題與因應之道

此部分朝向兩岸學術交流實質存在的變動因素，以及可能的解決方式著手，試圖梳理出促進兩岸學術交流的最佳途徑。

首先在交流障礙方面，受訪者呈現出的意見中，明顯地指出大陸方面衍生之障礙比起臺灣方面多出許多，在統計數字各項都比臺灣高。尤其是「政治因素」雖然在兩岸方面都是名列障礙因素之前矛，但大陸方面以 4.64 的高度之平均值，也再次以專家學者集體數字證明兩岸學術交流最大的障礙乃在於此。同時，在技術層面上，顯然大陸在法令、程序上多有未盡完善之處，當然我政府方面刻意的刁難也在受訪者的意見中表現無疑。臺灣方面顯然在價值觀念以及執行層面上

較受批評，包括對彼岸的歧視與偏見，以及資源分配上都有待加強。

在問及何者有助拓展學術交流的多項措施中，受訪意見中以加強年輕一代之交流、應用電腦網路的管道，以及民間或第三地的模式，試圖對現有時空環境的藩籬做一突破。反倒是多年來有關承認大陸學歷問題和開放公務員赴大陸訪問的爭議，因受訪學者對此議題意見紛歧，以致在平均值的排序上敬陪末座。然而，在各項交流方式中，時下常見的參訪活動或研討會模式，相較之下反而不受學者專家認同。受訪者認為包括蹲（駐）點研究、兩岸集體合作以及師資交流上，較具實質的交流效果。這顯示過去短期、走馬看花的方式，有待朝向長期、紮根的轉向，交流方式在質的深耕，比量的點綴應該更具實質作用。

（一）兩岸學術交流的障礙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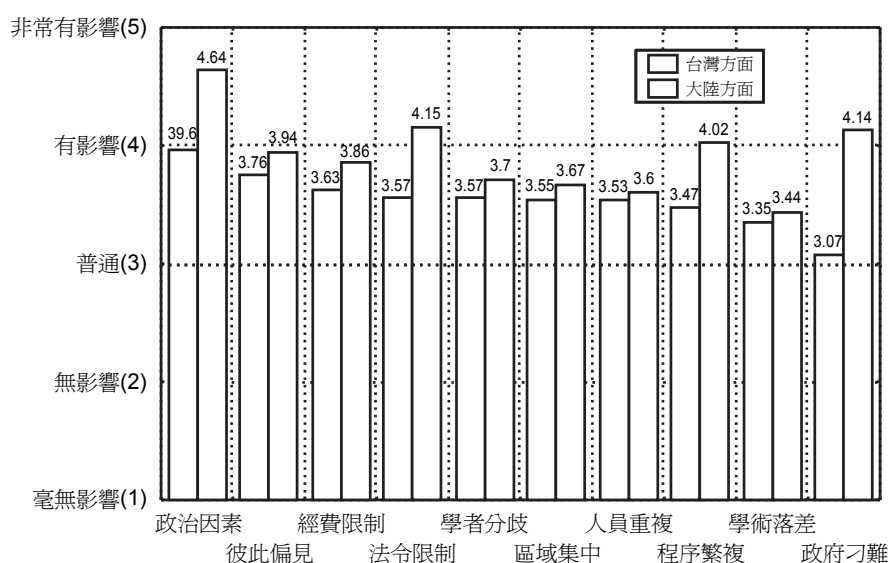
在兩岸學術交流存在之障礙因素探討中，臺灣方面「政治因素」以及「兩岸彼此的歧視與偏見」等問題，其問卷平均值分佔前二位，其中在「政治因素」中有七成一七的受訪者認為「有影響」或「非常有影響」，顯然政治因素的干預，以及長期兩岸隔閡造成的歧視與偏見等意識型態或價值觀念不同，是臺灣方面推動學術交流最大的障礙。

其次，在學術交流的實質執行的技術層面上，「經費限制」、「法令規章的限制」、「學者立場分歧」、「交流區域過於集中」以及「交流人員重複性高」，也在平均值的數字上顯示其對學術交流過程中產生的影響程度。反倒是「政府當局刻意刁難」部分，雖然意見分佈呈現常態鐘型的曲線，但是在與其他選項的數字比較起來相對較小，顯示政府在學術交流角色的扮演上並未構成干擾的障礙。

相較於臺灣方面的學術交流障礙，受訪的學者專家對大陸方面的諸多因素多有態度上著墨之處，諸如「政治因素」、「法令規章的限制」、「政府當局刻意刁難」以及「作業程序繁複雜亂」等四項，其平均都超過4以上，較諸臺灣方面平均值均落於4以下，顯示在此一交

流障礙問題上，受訪學者普遍認為大陸方面所製造的問題程度比臺灣方面明顯較多，也表示大陸方面才是學術交流障礙的製造者。

圖三 兩岸學術交流障礙因素之比較



在兩岸此一問題的相互比較方面，從圖三成對直方圖中，最明顯的是大陸方面各個選項的平均值都比臺灣方面高；此外，在的交叉檢定中，除了在「雙方學術水平落差」、「交流人員重複性高」和「交流區域過於集中」三個問題選項上不具顯著差異外，其餘七項選項兩岸的平均值差異均達 0.05 的顯著水準，表示兩岸都存有學術交流上的障礙，而大陸方面均顯著高於臺灣。

從兩岸資料交叉檢定的結果，在障礙平均值的優先排列上，兩岸也略顯不同，除了「政治因素」均列為最大障礙，尤其受訪者認為大陸方面的政治因素問題更為明顯，平均值更高達 4.64 在本研究的統計

分析中也是數值特別突出的。

其次，在「政府當局刻意刁難」一項中則是差異最大的項目，平均值差異高達 1.06，在臺灣方面在問題程度的平均值是列為最後一項，而在大陸方面則是排名第三位，僅次於「政治因素」和「法令規章的限制」。

再者，在「法令規章的限制」以及「作業程序繁複雜亂」也是兩岸排序差距甚為顯著的項目，尤其後者在臺灣方面排序第七，在大陸方面排序卻為第四。至於排除上述各項顯著不同外，其他的選項問題的排序竟然相當接近，可見這些在雙方偏見、經費限制、學者意見紛歧、交流區域集中、交流人員重複以及雙方學術水平落差方面的問題其認知程度的順序是所見略同。

（二）提昇學術交流措施之評價

在探索提昇學術交流的諸項措施的分析中，擴大兩岸年輕一輩的學者和學生的交流是最受注重的，顯見兩岸學術交流在交流上偏重現任學者、專家，而未著重在青年的交流是受訪學者專家普遍的共識；當然，年輕學者、學生的交流在經費、法令等重重門檻上令人卻步，也是政府以及相關人士推動兩岸交流需要深思的部分。

在電腦科技的運用上，倒也提供現有形式當諸多的障礙中，另闢較為新穎的方式，透過網際網路虛擬的管道，無遠弗屆的觸角以及無所禁忌的話題，在此相當另類學術論壇，倒也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同時，經費的問題也在受訪者的意見陳述中深受重視，配合年輕一輩的交流，獎助學金或研究經費的提供則是重要途徑。

其他在透過大陸海外學者以及民間第三地模式的學術交流也在受訪者的意見中受到重視；當然，另闢第二軌的管道或是專業對口單位的設立，則是政府相關單位努力的目標。反倒是採認大陸學歷以及開放公務員赴大陸訪問，在受訪者的意見表達中則呈現相對的弱勢，但其約 3.7 的平均值顯示在提昇學術交流的措施中也待有關當局投注心力。

參、學者在兩岸政策制定上所扮演的角色

此部分之分析著重在政府在兩岸交流政策制定面向，朝向兩岸學術交流實質存在的變動因素以及可能的解決方式著手，試圖找出促進兩岸學術交流的最適途徑。

首先在兩岸政策上，政府與學者互動的管道中，以「接受諮詢」與「研究報告、發表論文」之比例居高，但這也顯示政府瞭解學界意見也侷限於特定人士與特定方式；相對一般常出現在媒體的公開或多元的方式，則在受訪者的意見反應中，認為政府在兩岸政策上並非真正廣納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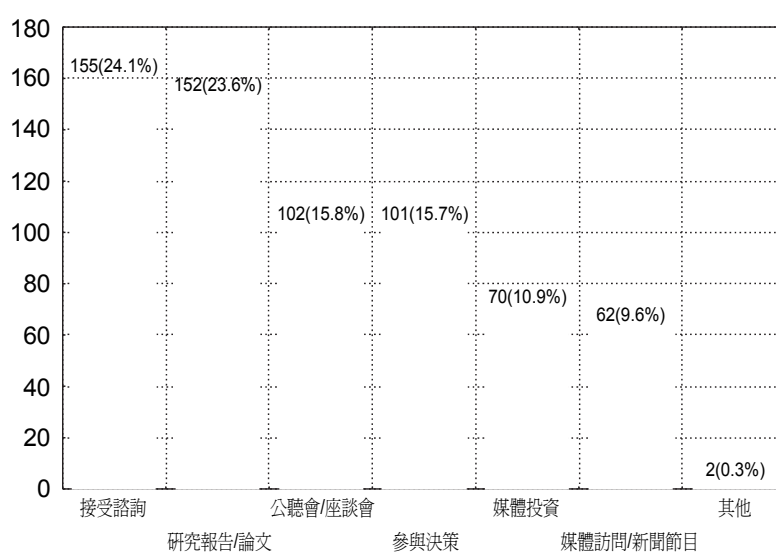
其次，在兩岸學人對其政府當局影響力的比較中，雙方並無顯著差異，當然這些現象也說明同文同種的價值文化，即使在政治制度與氛圍不同之下，政府仍然是本位至上；當然這也指出兩岸決策高層對學界的智慧沒有真正充分運用。

在邀請訪臺的對象中，涉臺單位研究機構的學人以其理性思維和政治敏感兼俱的多重層面下，充分臨近權力核心展現其加乘的幕後影響潛力；反倒是臺辦官員因淪為對臺政策的次要執行機關，其影響力在受訪者的意見反映中，也僅略高於學科的專業人才。

當然，前述分析顯示，政治因素是兩岸學術交流最大的障礙之一，李前總統「兩國論」的提出同樣給中立色彩的學術交流帶來負面衝擊。即使李前總統的決策是一種策略佈局，但雙方學術互動也不免受到不利的影響。

一、學者與政府在兩岸政策之溝通管道

圖四 政府瞭解學者兩岸政策意見之管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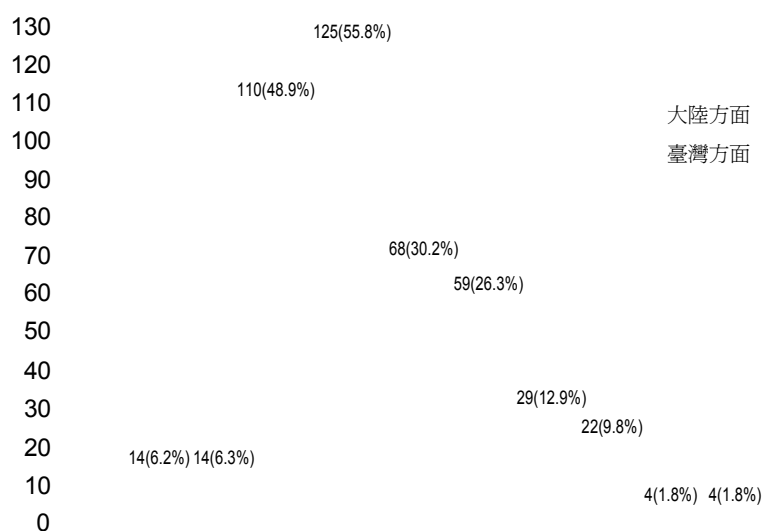
圖四顯示，受訪者認為「接受諮詢」以及「研究報告、發表論文」的方式是政府瞭解學者意見的管道，在此項複選題中，選填這兩種方式的人數接近七成，且與其他選項有明顯的差距；相較之下，認為「媒體投書」和「媒體訪問、新聞性節目」的方式的比例則不至前者的半數。以這前、後兩組選項特性的分析中，試圖可以作一解釋的是：政府在與學者的在兩岸政策的溝通管道上仍傾向於特定的對象和管道，對於一般普遍在媒體或新聞節目中出現學術社群的聲音，則重視的程度稍嫌不足。

當然，這是否意味政府來自的學術界的意見是由少數人士的封閉區域所主導，這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議題。同樣地，兩岸問題的特殊

性與敏感性特質，是否也相對造成許多問題並不能完全以一般學術論壇的理想形式，以公開、透明的方式和場合充分討論，以及制訂決策，或許造成政府兩岸政策之學術智囊較為封閉的因素，連帶產生臺灣的大陸政策在民意與政府決策上多所落差的原因之一。

二、兩岸學者對其政府當局決策影響力之比較

圖五 兩岸學者對其政府當局決策影響力之比較



(平均值 大陸方面 = 2.55；臺灣方面 = 2.45；ANOVA $P = 0.22 >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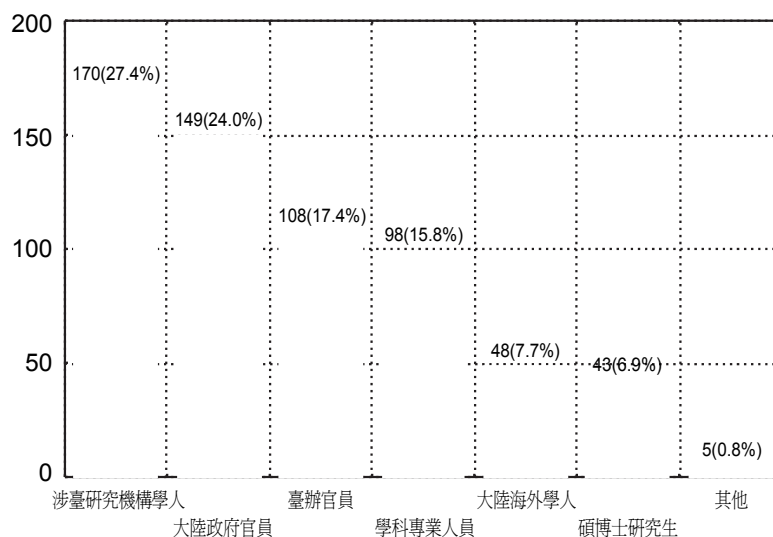
政府制訂政策一般常受學者專家的間接影響或直接參與政策過程。然而，事實上政府決策當局與學術社群之間確存在相互態度與溝通條件的不同，而產生彼此相異的認知落差，造成政府無法廣納建言以及學界靜語難現，這也正是公共政策學界中所謂「二元社群」(two-community)理論²所欲探究與解答的問題，本題項即以兩岸政策制訂過程中，雙方學者是否同樣具有「二元社群」理論中存在的溝通障礙

之現象。

從 ANOVA 的統計分析中，兩岸學人對其政府當局決策的影響力並無顯著不同（差異顯著性檢定並未達 0.05 的顯著水準），再就整體的意見分佈情形分析，圖五成對直方圖顯示，受訪者對兩岸學人的決策影響力相當接近，平均值都位於「普通」與「稍有影響」之間，也說明即使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及意識型態，中國人官場的封閉與本位主義，兩岸還是所差無多，雖然平均值在統計分析中沒有顯著差異，然而臺灣方面的平均值 2.45 仍然稍高於大陸方面的 2.55，這一點也可從圖五的次數分配曲線觀察得知，可見臺灣的決策多元、開放性還是比起彼岸略勝一籌。

三、臺灣邀訪對象在大陸對臺政策影響力之評價

圖六 臺灣邀訪對象在大陸對臺政策之影響力（複選）



此一題型乃針對大陸來臺訪問人士，對大陸當局決策影響力之比較分析。圖六顯示，將近七成五六的受訪學者專家都認為，「涉臺單位研究機構學人」在諸多來臺人士中，其在中共對臺政策最具影響力，顯見這些隱居幕後的智囊團其具官方與學術的色彩，反而成為在對臺政策理性思維與政治敏感兼備的有力人士，其對大陸權力核心的潛在影響力值得重視不容小覷。

其次，「大陸政府官員」一項中以六成六受訪者的認同率居次，由於其來自各部門乃實際擬定政策人員，當然也在決策圈中佔有重要地位。反而，「臺辦官員」之影響力雖有四成八受訪者的共識，但是明顯落於前二者近二成，甚至與較具中立、客觀色彩的「各學科專業人才」之比例相當接近，此種現象足堪玩味，或許臺辦單位在大陸各部門的權力相較屬邊緣區域，且實際決策乃中共中央高層，臺辦淪為對臺政策的實際執行的部門之一，也削弱臺辦官員在中共權力核心的影響力。

當然，「大陸海外學人」與「碩博士研究生」兩個選項敬陪末座乃意料之中，這也明顯指出就當前實力而言，這些學人（生）根本與大陸權力核心尚沾不到邊。但是在本題中受訪者學者專家也以二成的選答支持率，顯示這些人士的影響力。

此外，在本研究先前進行的深度訪談中，不少學者專家提出這些學人（生），乃中共未來最具潛力的接班明日之星，且以其具有學術中立、開放的理性色彩，也是未來兩岸學術交流在長期、紮根的面向上需要著力之處。同時，連接前述分析結果，「擴大年輕學者、學生

2. 「二元社群」理論（又譯作「雙群體理論」）認為學者專家與政策制訂者，通常是處於迥然不同的兩個世界，有不同的生活形式何不同的價值觀，故此種差異性常常造成政策制訂者未能應用學者專家研究之成果或建言。請見翁興利，《公共政策：知識應用與政策制訂》（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頁139-142。

的交流」乃受訪人員認為有助雙方從是學術交流最佳之措施，交互印證之下年輕一代或許在兩岸學術交流之長遠策略上，深具投資潛力的群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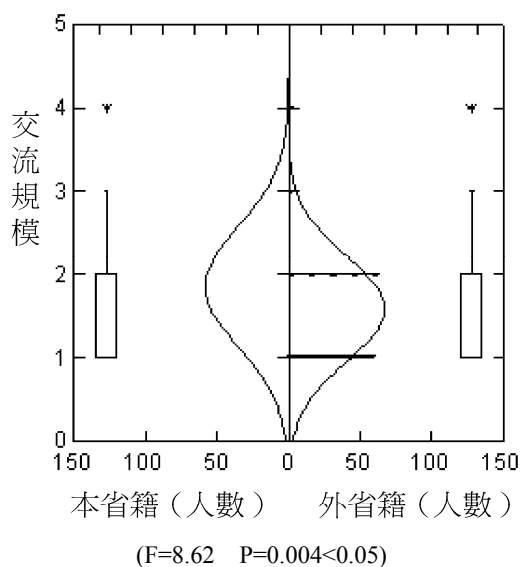
四、交叉分析

本研究交叉分析之步驟，首先針對本次問卷之各項問題之間，進行全面性之變異數（ANOVA）分析，試圖整理出變項之間所有可能存在之各項關係。再者，從ANOVA分析中出現顯著水準之成對變數間，核對本研究之問題假設或者重新探索成對變數可能產生之新的問題假設。

最後，根據合乎研究假設以及嚴謹統計數據之成對變數，進行交互檢核、分析；並將具有顯著水準之問題假設，進一步以平均值比較或次數分配之方式呈現出其中的問題內涵與可能之發展。

（一）對兩岸學術交流規模之認知，籍貫之間具有顯著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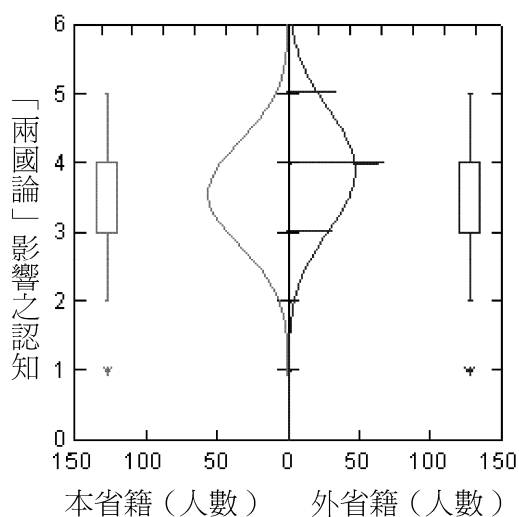
圖七 籍貫與交流規模之 ANOVA 曲線



從ANOVA檢定分析可知，在對兩岸學術交流互動規模的認知上，籍貫之間具有明顯之不同（顯著水準小於0.05）。進一步分析受訪者籍貫間之量表平均數：本省籍為1.86；外省籍為1.58。對照原始問卷量表以及觀察圖七之分配曲線圖可知，對學術交流規模之認知，外省籍比本省籍之受訪者，更為傾向擴大學術交流之規模。

（二）對「兩國論」影響認知，籍貫間具有顯著差異

圖八 籍貫與「兩國論」影響認知之ANOVA曲線



($F=9.30$ $P=0.003<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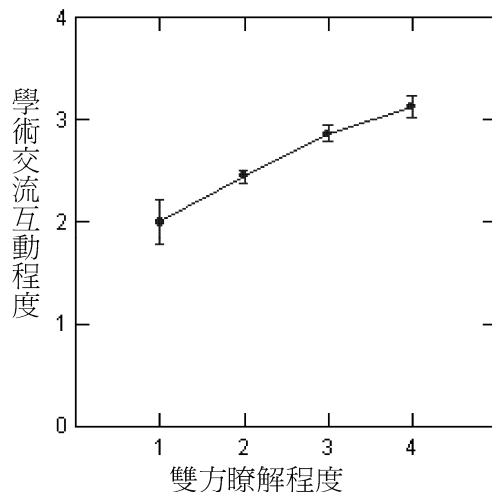
ANOVA檢定分析顯示，在李前總統提出之「兩國論」對兩岸學術交流之影響態度上，不同籍貫之間具有明顯之不同（顯著水準小於0.05）。分析受訪者不同籍貫之受訪者之態度量表平均數：本省籍為3.56；外省籍為3.90。再予以對照原始問卷量表文字敘述以及觀察圖八之分配曲線圖，可以從統計數據中分析得知，對「兩國論」帶來之

影響評價中，外省籍的受訪者似乎明顯地比本省籍的受訪者態度上的傾向較為悲觀，也就是指出外省籍受訪者認為「兩國論」對學術交流規模之衝擊，比起本省籍之學者專家之態度，顯然是認定李前總統的「兩國論」為兩岸學術交流帶來更多負面的影響。

（三）學術交流互動與瞭解程度之交叉分析

統計分析顯示，兩岸開放交流以來，在學術交流互動程度與雙方瞭解程度兩項態度量表之間，呈現顯著性之差異水準。再從圖九最小平方均值曲線圖中可以明顯看出，兩者之間關係乃是以正相關型態出現；換句話說，受訪學者專家之態度上，認為學術交流互動情況愈佳者，通常其認為兩岸開放交流以來，雙方之瞭解程度也愈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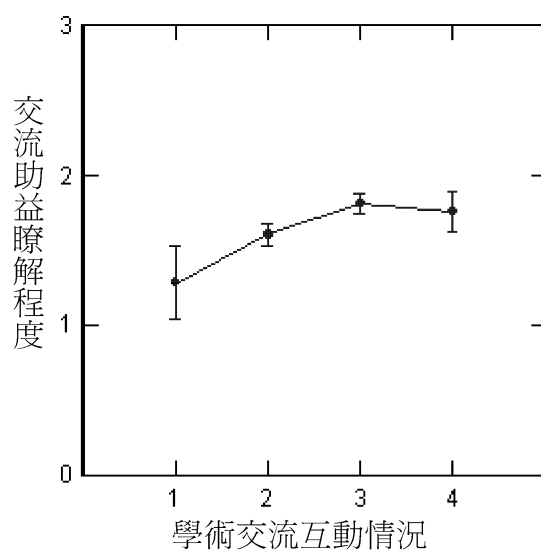
圖九 學術交流互動與瞭解程度之 ANOVA 曲線



($F=15.49$ $P=0.000<0.05$)

(四) 交流助益瞭解評價與互動情況之交叉分析

圖十 交流助益瞭解評價與互動情況之 ANOVA 曲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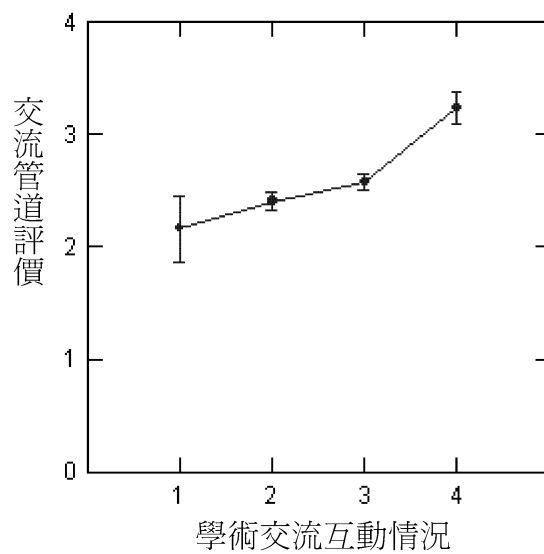


(F=2.69 P=0.047<0.05)

ANOVA分析顯示，透過學術交流是否有助於兩岸彼此的瞭解之態度量表，與學術交流雙方互動情況兩項態度量表之間選項具有顯著差異。圖十曲線圖中，兩者略呈現一種正相關的關係，換言之，認為雙方互動情況良好之受訪者，其整體態度上同樣反應在認為學術交流有助彼此瞭解。然而，在認為互動情況「不佳」一項中，受訪者態度卻不盡然出現此一相關關係，其平均值略微下降一些；雖是如此，總體而言，在互動狀況之各選項中，普遍認為學術交流是有助兩岸彼此之瞭解（平均值皆小於2「有些幫助」）。

(五) 交流管道評價與互動情況之交叉分析

圖十一 交流管道評價與互動情況之 ANOVA 曲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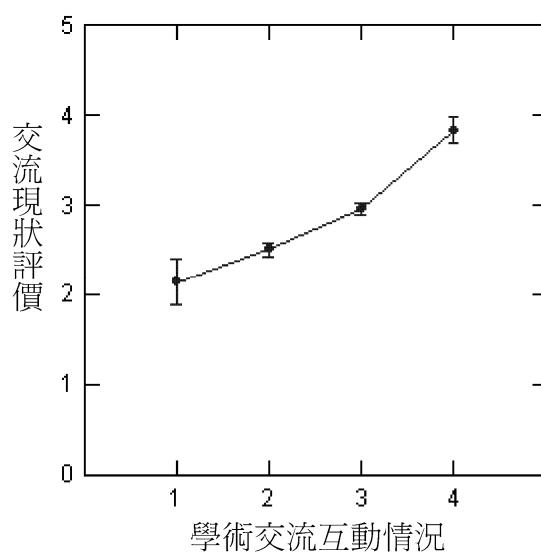


($F=9.11$ $P=0.000<0.05$)

交流管道評價與互動情況之 ANOVA 分析顯示，兩項態度量表之間選項具有顯著差異。從圖十一分析曲線可以明顯瞭解，兩者之間出現正相關的趨勢。簡言之，認為雙方互動情況良好之受訪者，其整體態度上同樣反應在學術交流管道之暢通性。但是在認為互動情況「不佳」項目中，受訪者態度出現較為急遽的改變，其平均值落於選項 3「普通」與選項 4「不暢通」之間。

(六) 交流現狀評價與互動情況之交叉分析

圖十二 交流現狀評價與互動情況之 ANOVA 曲線



(F=25.11 P=0.000<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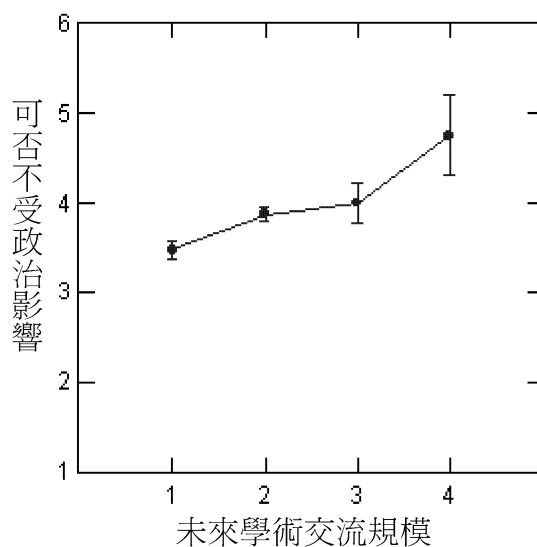
交流現況評價與互動情況之 ANOVA 檢定中的差異，可從圖十二之分析曲線反應兩者之間的正相關趨勢；也就是說，認為學術交流互動情況愈佳者，對當前兩岸學術交流現況之評價也表現出較為滿意的整體態度。在之前分析也另有跡象透露，在「學術交流互動情況」之選項 3、4，相對之「交流現況評價」之平均值也約落於 3、4 之位置；但是，在「學術交流互動情況」之選項 1、2 上，相對之「交流現況評價」之平均值卻明顯落後於平均值 2、3 之間，其中表示即使受訪者認為互動情況不錯，但在現況評價上卻顯出落差的態度。

(七) 政治影響交流評價與交流規模之交叉分析

學術交流未來的規模與學術交流能否不受政治影響，這兩者議題之間的關係也是研究一個值得注意的焦點。ANOVA 分析顯現兩者在量表的數據中出現明顯的差異；基本上，受訪者普遍認為不太可能不受政治因素的影響，但是相對於「未來學術交流規模」的認知選項中，這種對政治影響交流的態度上有程度上的不同。

從圖十三曲線圖中，明顯地顯示認為未來學術交流愈應縮減規模之受訪者，其態度上認為學術交流愈不可能不受政治的影響。這也說明在受訪者的認知中，未來學術交流的規模顯然是相當程度受到政治因素的牽制。

圖十三 交流前景評價與交流現況評價之 ANOVA 曲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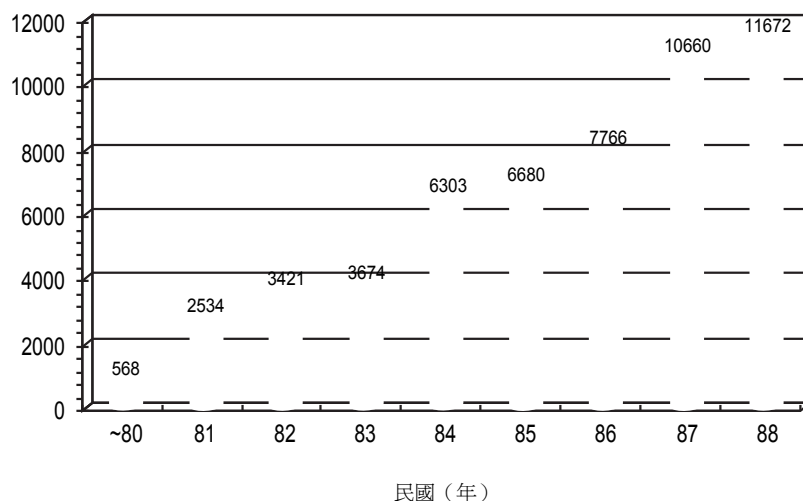


($F=5.65$ $P=0.001<0.05$)

肆、兩岸學術交流政策之比較與策略建議

一、兩岸學術交流政策之比較

圖十四 大陸人士來臺從事文教交流統計圖



資料來源：同註4。

自我政府於民國76年開放大陸探親後，兩岸學術交流活動亦在政府支持下陸續推動，兩岸學人參訪與研討活動亦絡繹於途。³根據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之資料顯示，截至88年底，共核准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文教活動計53,228人次，其中包括來臺從事一般文教交流活動、大眾傳播活動，以及宗教活動等人士。整體而言，大陸人士來臺以一般文教交流活動（41,193人次）及大眾傳播活動（4,647人次）

3. 〈臺灣開放探親政策加速兩岸交流〉，《大公報》，1988年1月9日，版5。

為多。87、88兩年間核准來臺人次均超過萬人次以上。⁴從我政府核發短期停留許可之大陸人士統計資料顯示，87年為103,028人次、88年為114,280人次，這類短期停留人士其中屬於參訪性質人數分別在這兩年是15,831人次和18,191人次，分佔該年度短期停留之16.22%以及15.92%。同時，近三年臺灣地區人民前往大陸地區報備人數，從八十六年之83,420人、87年之134,805人，以及88年之272,082人，均接近倍數的比例成長。⁵從圖十四也充分顯示，儘管兩岸政局風波不斷，兩岸學術交流卻持續成長。

上述數據顯示，兩岸雙方互動人數逐漸增加，特別是兩岸學術交流活動在雙方的互動與交流運作中亦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歸納而言，兩岸學術交流政策比較具下列特性：

（一）臺灣採「去鬆來緊」原則，中共採「來鬆去緊」原則

政府部門對臺灣學生赴大陸求學，或是學者赴大陸交流並無限制措施。雖然早期公教人員尚須審批，但近年來僅須辦理請假手續便可逕赴大陸地區進行學術交流活動。不過，對於大陸學者來臺進行學術交流活動，政府當局政策似趨保守，且申請程序之繁瑣亦限制了雙方交流的頻率與廣度。

在大陸方面，雖對臺灣學人學術交流入境採較寬鬆的政策，但是對往訪次數較多或較具政治敏感性之團體、個人則採取管理措施（如行前附詳細行程、聯絡單位與個人署名），始批准臺胞證之申請，或否決其入境之許可。一位傾向支持民進黨之學者即長期無法取得大陸

4. 〈兩岸交流統計摘要（文教類）〉，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9年1月20日。〈http://www.mac.gov.tw/statistic/ass_ce/890120/890120.htm〉。（2000/05/10）。

5. 〈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最近三年各類人數統計表〉，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1999年1月13日。〈<http://www.immigration.gov.tw/Yeartal.htm>〉。（2000/05/10）。

入境之許可。⁶

大中共當局對陸學人赴臺交流之審批則頗嚴格，其中不僅涉及政治審查、研討主題與邀訪單位之考量，更須面臨層層之官僚程序批轉，以及「國臺辦」交流局審批核可。換言之，儘管中共基本上採取鼓勵學術交流之政策，但是對本身交流成員之掌控、政策與論點之約束，以及赴臺期間的政治紀律，皆有較嚴謹之要求。⁷

（二）制定法規規範學術交流活動

兩岸學術交流法規主要在於規範交流活動之申請程序、操作方法與注意事項，進而促使交流活動與秩序得以維繫。基本上，兩岸在八〇年代末期、九〇年代初期相繼制定涉及學術與人員交流之法規（請見表一），臺灣方面法規多為規範性與政策性之內涵為主；大陸方面之法規則較多政治顧慮與考量，反映其對兩岸交流之防衛心態。

（三）採取鼓勵與促進措施，但程度與形態有別

針對兩岸學術交流，兩岸政府當局皆採取鼓勵與促進之措施，⁸其中包括相互邀訪、提供交流機會，以及促成交流領域的擴大與深化。⁹不過，在運作過程中，我政府大陸委員會提供經費獎助、設立「中華發展基金」推動學術交流，以及獎助兩岸學人互訪與教學，皆發揮促進兩岸學術交流的積極角色。¹⁰

6. 訪談所獲得資訊。

7.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對臺工作的通知〉，中發（1991）3號文件，《中共對臺工作研析與文件彙編》（臺北：法務部調查局，1994年），頁94-102。

8. 袁祖德，〈海基海協兩會多多交流〉，《經濟日報》，1998年11月21日，版11；〈中共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等四各部內關於大陸公民赴臺進行經貿交流等活動的暫行規定〉，《大陸工作參考資料》（臺北：行政院陸委會，1998年），頁123-127；《中國臺灣問題》（1版）（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8年），頁154-155。

9. 《中國教育年鑑（1998）》（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13。

表一 兩岸制定學術交流法規一覽表

【臺灣】	
1991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海峽兩岸民間交流活動作業要點》(80/05/15)
1993	《大陸地區科技人士來臺從事研究許可辦法》(82/5/31) 《民間團體赴大陸交流須知》(82/12/01)
1998	《中華發展基金會補助辦理兩岸交流活動作業要點》(87/05/26)
1999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及學生來臺從事文教活動審查要點》(88/02/05)
1999	《邀請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活動須知》(88/04/13)
1999	《接待大陸地區人士來臺交流注意事項》(88/04/21)
【大陸】	
1988	《關於做好赴臺人員思想教育工作的意見》(1988/11/18)
1989	《國務院臺辦關於做好大陸人員赴臺工作的意見》(1989/12/13)
1990	《國家教育委員會關於對臺灣進行教育交流的若干規定》 《社科院關於開展對臺社會科學學術交流與合作的暫行規定》 《國家科委關於開展對臺灣科技學術交流與合作的暫行規定》
1991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對臺工作的通知》(1991/01/28)

資料來源：1.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兩岸文教交流法規》（臺北：行政院陸委會，1994年），第參1—捌，頁33。
 2. 《臺聯工作手冊》（1990年5月），頁49-54。
 3.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工作法規彙編》（修訂四版）（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9年），第肆，頁63-86。
 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中共對臺文教交流策略文件彙編》（1版）（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5年），頁63-70、99-102。

此外，臺灣民間基金會與團體亦提供頗為豐沛的學術交流機會與資源，促成了雙方交流的實質進展。¹¹反觀，大陸推動之學術交流活動多由官方所主導，也由於大陸民間社會的相對弱化和涉臺問題的政治敏感性，因此涉臺問題之學術交流活動多是由官方所操控，其運作之鬆弛或取向亦深受兩岸關係和平與敵對的程度而定。換言之，一旦兩岸政治敵對態勢升高，勢必降低學術交流的層次與規模；反之則基本採取鼓勵之態度。

（四）開放、影響作為與防衛心態並存

兩岸執政當局在採取鼓勵與促進學術交流的政策的同时，亦期望透過交流活動擴大政治影響，縮小雙方認知差距，並爭取認同感。換言之，我政府部門推動兩岸學術交流，委託學術機構辦理相關活動，並參訪臺灣政經建設，期能促使大陸學人能對臺灣政經發展歷程與現實能有更客觀之認識，進而化解敵意，從而體驗雙方制度之優劣。¹²

不過，中共當局由官方主導之涉臺學術交流活動頗具政治色彩。在中共對臺政策「一國兩制」的基本框架下，中共對「臺獨」傾向、反對「三通」，以及「戒急用忍」政策言論之批判，已成為其重點訴求。中共當局對臺灣學人參訪活動之安排，亦期能瞭解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以及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並以民族情感爭取臺灣學人之認同。¹³儘管如此，雙方學術交流仍不盡理想，體現為彼此信任差距與防衛心態。

10.《中華發展基金年報（1994－1998）》（臺北：中華發展基金，1998年），頁3；〈陸委會公佈第二屆兩岸交流民間團體優良事蹟一覽表〉，《兩岸文教交流通訊》，第12期，1998年7月1日，頁8；張京育，《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簡介》（臺北：行政院陸委會，1997年），頁17、20-21。

11.同註10，頁9-54。

12.〈張京育在中央常會報告〉，《大陸工作參考資料》（臺北：行政院陸委會，1998年），頁797。

13.同《表1》，資料來源4，頁29-38。

（五）賦予學術角色與功能定位不同

基本上，臺灣地區在政治民主化發展背景下，學術之定位與功能較強調多元化與中立性。其中雖不免仍有學術為政治服務之現象，但是近年來無論是學術研究之論證或是素質之提升，皆有明顯之進展。以「大陸研究」學門為例，基本上已由過去官方主導教條式的批判，逐步轉化為自主性高的學術探討與對話；學術研討與政策論爭亦包容不同黨派與統獨議題。

然而，中共的「臺灣研究」學門則有官方主導鮮明的政治立場，對臺問題專業的學術研究十分有限。基本上，中共將對臺學術研究定位為「為政治服務」之角色。這可由其論文之政治色彩與立場不脫「一國兩制」的基調可知。以中共對臺部門召開之兩岸學術研討會為例，其作為政策辯爭的空間十分有限，一旦有超越中共容忍限度之言論，便極易遭圍剿。

（六）青年交流政策與心態有別，政治制約因素仍大

基本上，我政府對青年學子赴大陸求學或是交流訪問，多採放任與不反對之態度。換言之，青年學生若無兵役問題之限制，多可赴大陸就學；對於大陸教授與學生，到目前僅允許短期教學與蹲點研究，尚未開放碩、博士學位之研讀。此外，目前為止政府尚未採認大陸學歷，因此也使得雙方的學術交流規模與意願深受影響，¹⁴其中政治考量恐是主要限制因素。

反觀中共當局則對青年交流採取較為保守之政策。例如，「辜汪會談」中曾提及強化雙方之青年交流，但實際上中共當局多批准年齡較大的和低齡小朋友的來臺交流。一方面，年齡大的較為忠實可靠；年齡小的則不易受到影響與衝擊。儘管如此，中共近年亦逐步放寬青年學者之互訪，甚而主動安排兩岸青年交流活動，這可能與增強臺灣

14.〈張主任委員京育在年終記者會之談話及問答摘要〉，《大陸工作參考資料》（臺北：行政院陸委會，1998年），頁797。

青年對中國大陸的認同感，以及兩岸統獨情勢的變化有關。

二、SWOT 分析與交流策略建議

兩岸關係夾雜著競爭與合作、對立與統一、戰爭與和平等諸般矛盾與弔詭的情節。在這複雜糾葛的情勢下，任何思考與作為都無法避免牽一髮動全身之效應；同時，也因環境之錯綜複雜，單純推動兩岸學術交流之活動，往往在重重窒礙下胎死腹中。

猶如兵法所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兩岸學術交流無論資源與方法，也必須掌握此兵法之要，方能佈點、連線、構面，形成一個綿密的交流溝通網絡。SWOT 分析，便是運用其中兵法特質之「策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分析途徑，藉由連接時間的縱貫面，以及涵蓋空間的橫斷面思維模式，建構一個問題解決導向之政策實踐的一項重要工具。

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的解析、學者專家的深度訪談，以及問卷調查的集體指標，從當前臺灣現有的學術交流條件，試圖自組織內部與外部的區隔，整理出適合臺灣進行學術交流各種條件。¹⁵換言之，利用 SWOT 分析進行兩岸學術交流策略的研究，一方面瞭解自己的優勢條件（Strength）與弱勢條件（Weakness）；另一方面則注意外在環境變遷的特質，掌握機會（Opportunity）、迴避威脅（Threat），進而研擬相關的學術交流行動策略。

首先對內、外環境偵測結果如下：

（一）外部環境偵測

1. 機會：後冷戰時期國際大和解；國際情勢樂見兩岸和平發展；經濟、科技發展國與國界線模糊；共同關注議題增多，如經濟、環保、犯罪；學術交流色彩中立，較不受政治、意識型態限制；學術交

15. SWOT 分析之來源皆源自本研究之文獻分析、問卷調查、座談會以及深度訪談等，本文限於篇幅不予詳載。

流乃兩岸既有之互惠共識；大陸進行改革、開放；大陸需要學術交流協助發展；大陸海外學者、學生逐漸增多

2. 威脅：政治掛帥，無限上綱難以突破；學術交流效果緩慢，難見速效；大陸方面法令、管制過多；交流人員重複性過高；大陸方面申請程序繁複；大陸學人經費有限；彼此互信度仍脆弱；交流偏重沿海政治、經濟重鎮；交流欠缺秩序，也無良好互動機制；年輕一輩交流不足；交流內容深度不足。

（二）內部環境偵測

1. 優勢：學術交流的人員、方式、管道相當多元；政府與民間單位經費較為充裕；民間單位具有活力；臺灣民主化、經濟發展具有經驗；資訊暢通、科技發達；專業學術研究能力高於大陸；學界人士相當積極。

2. 弱勢：政府缺乏整體交流政策；經費、資源分配不公；多為走馬看花方式之參訪、研討；對大陸存有歧視或偏見；公務員尚未開放交流；尚未採認大陸學歷；學界意見紛歧；僵化之兩岸政策影響交流。

其次，經由環境偵測之結果進行 SWOT 分析，分別依 SO、ST、WO 及 WT 之策略分析組合，茲擬定之交流策略建議如下：

（一）SO 策略：掌握機會、發揮優點的策略

進入後冷戰時期，全球一片大和解的浪潮；加上網路科技發達，以及國際經濟的相互依存，國際情勢樂見兩岸和平發展。臺灣必須掌握國際和平之趨勢，並運用民主多元的活力以及電腦科技的優勢，來開拓兩岸學術交流的契機。例如：(1)透過第三地或國際組織（如 WTO、IMF 等），進行雙邊或多邊論壇；(2)運用網路科技進行交流；(3)針對大陸海外學人進行學術交流；(4)開設暑期學者講座。

（二）ST 策略：展現優點、避免威脅的策略

政治掛帥以及中共官方的法令管制是兩岸學術交流之重要障礙，相較之下，多元的活力以及充裕的資源，便可以活躍、游擊式的交流

方式，進行點與點的突破。例如：(1)透過基金會等非營利組織（NPO）或非政府組織（NGO）的運作，避免政治、官方色彩過重；(2)以臺灣領先經驗，如經濟、電腦、環保等學術議題，進行純學術交流；(3)透過迂迴途徑，減少法令管制；(4)提供或補助中共優秀學術人才，來臺參訪或研究；(5)開拓交流區域，避免集中沿海政經區域；(6)鼓勵兩岸團隊合作，培養默契增進瞭解；(7)贊助年輕一輩交流，深耕未來。

（三）WO 策略：利用機會、克服弱點的策略

交流政策的散亂以及交流資源的分配不均，的確也在臺灣本身形成交流障礙。如何隨著環境提供的機會，克服本身的障礙，方能提升學術交流的實質成效。例如：(1)成立公信團體，評鑑官方與民間的交流活動；(2)召開國際會議，檢討兩岸交流癥結；(3)鼓勵民間單位投入兩岸交流活動；(4)組成國際團隊，進行跨國區域性研究；(5)檢討政府政策，督促制訂整體交流制度；(6)開放大陸或其海外學人來臺研究或講學；(7)分階段開放公務員至大陸交流。

（四）WT 策略：減少弱點、避免威脅的策略

環境的威脅以及內部的弱勢條件，必須加以消除或隱匿，降低其對兩岸學術交流帶來的衝擊。例如：(1)分階段逐步採認大陸學歷，增進友好實質互動；(2)避免政治性主題，迴避意識型態；(3)從低敏感性、具共識議題，建立互信；(4)凝聚內部共識，減少自身內部分歧；(5)制定大陸現狀教材，增進青年相互瞭解；(6)尊重彼此文化與制度，相互包容。

伍、結論

學術交流不僅有助於學人相互瞭解與情誼增進，更可理解對方政治立場與思維方式，其對雙方誤解的消除與立場的掌握皆有助益。基本上，臺灣的「大陸研究」學者對現行大陸政策的影響與決策空間有限；另一方面，中共對「臺灣研究」學者的政治控制仍嚴，對臺敵意

與防衛心態仍未消除，加之中共主導之涉臺學術討論仍難脫主觀宣教式之安排，因而難以發揮影響決策之效果。此外，由於兩岸關係與互動在互信基礎脆弱，以及潛在敵意短期內難以化解，尤其是雙方政治互動不足與領導人無法造訪的情勢下，亦難突破兩岸僵局。儘管如此，中共涉臺系統與臺灣大陸研究學門之交流，對於雙方思想觀念的溝通、體察對方政治發展與生態變遷，以及相互間政策底線之瞭解均能產生實質「界面」（interface）作用。在本研究問卷調查、深度訪談以及座談會的結果皆顯示，學術交流有助相互瞭解，也傾向擴大學術交流規模，顯示此一「界面」作用能有效發揮，將有助於奠定未來兩岸政治談判與互動之基礎；反之，兩岸之政治互動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欠缺實質學術研究環境、過多的應酬、官僚體系運作僵化、僚氣與流程繁瑣之制約，以及有限的交流資源分派扭曲，仍是當前兩岸學術交流缺失。此外，對於兩岸政、經、社會各層面的深度研究仍顯不足，無論研究主題探討或是學術訪談成效皆十分有限，而大陸訪臺之學者政治忌諱較多，體察與分析臺灣人民心態與情勢之專業性不足，官式安排亦流於形式接待與政策辯解，因而雙方學術交流功能仍有其局限性。同時，研究中發現，除了政治、法令等實質交流障礙，交流人員結構面上的特性，都發現人員重複與特定學群的色彩，如何打破現有交流規模與範疇，擴及全方位、多領域的交流，值得吾人努力與思考。

就政經體制的差異性而言，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態，並未歷經民主政治之發展，加之欠缺國際觀的歷練與對民主理念的正確認識，以及「走馬看花」式的學術參訪而非長期蹲點研究，因而難以體驗與理解臺灣多元化與民主化之現象。尤其是涉臺系統因主題研究政治敏感，揮發空間有限，欠缺學術性，以及研究人員待遇與福利相對偏低，因而難以吸引一流人才參與。加之語言能力不足（上海與北京地區涉臺成員除少部分臺籍人士外，多不諳甚至不屑學習閩

南語）、研究資訊與專業素養不足（所撰文章附註來源多是臺灣報紙）與政治觀點之限制性，因而涉臺研究人員之研究成果，未能引起大陸學術界的重視，其影響力亦有其局限性。

近年來，大陸赴海外求學之學人已逐漸在西方社會嶄露頭角，並在歐美高等院校與研究單位擔任教職。這些學人對中國大陸政經發展與兩岸關係發展亦常提出建言，發揮一定之影響力。這些學人影響力大於大陸學者主因在於：一方面，這些學人能在海外立足，不必依附中共，較無政治顧慮，因而敢於對「臺灣問題」放言闊論；另一方面，大陸海外學人學有專長，也經歷西方民主社會運作，因而對「臺灣問題」提出較深刻且客觀之分析。此外，就大陸學人之影響力而論，中共「臺灣研究」學人基本上可區隔為行政體系與高等院校之學人。就影響力而論，前者的影響力顯然大於後者。此外，就地理區位而論，臨近北京、上海，且單位負責人具影響力之對臺決策人士，則其隸屬之「臺灣研究」學人影響力便較為明顯。例如，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的影響力便大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此外，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與上海臺灣研究所、上海臺灣研究會，皆因其特殊的對臺政治角色與決策成員，而凸顯其重要性。儘管如此，大陸高等院校亦不乏優秀之臺灣研究人才，其個別對臺專業學術研究與觀點，亦能對決策人士產生影響。

儘管兩岸學術交流雙方仍存有認知差距，但卻不必寄望對方改變立場，亦不必過於嚴肅的辯爭政治議題。多增加交流情感之培養與臺灣政經發展的感性理解與理性認知，即有助於交流功能之發揮。事實上，存在認知差距的學術交流與互動，相較於中斷兩岸學術交流而言，顯然是前者對雙方都有利，亦即「交流比不交流好」、「做比不做好」。此外，儘管兩岸目前學術交流利弊互見，實質功能亦有其侷限性，其對決策之影響力亦有限，但學術交流與對話，仍是推進兩岸關係發展值得積極開展之工作。因此政府大陸事務部門如何寬籌經費，更有效率與公平分派交流資源；提供便民措施與消除官僚作風，

規避泛政治化之干擾，以利學術交流工作之推動，始能在兩岸學術交流互動的過程中奠立主動與優勢地位。

基本上，臺灣之「大陸研究學門」之專家，在大陸事務決策與運作過程中並未受到應有之重視，也未做專業功能之整合，因而其對決策參與和政策思考之空間便十分有限。未來臺灣之「大陸研究學門」如何透過臺灣社會各領域之專業人才做整合性分工與研究，並強化與大陸學術界之交流與互動，諒有助於大陸研究專業分析與研究成果之提升。此外，政府大陸事務部門亦應積極強化專業性、策略性人才之吸納，而非仰賴業務性官僚主導大陸事務與交流工作。執行兩岸學術交流之審查與承辦部門亦應強化服務品質之提升與作業流程之再簡化。如何篩選大陸具理性、專業素養與具決策影響力之專業人才來臺交流，壓縮不具學術背景之官僚、政客，以及對臺不友善人士之交流空間，亦有助於兩岸交流品質之提升與交流秩序之維護。

就兩岸學術交流比較而論，臺灣地區民間團體的自主性與豐沛活力，無疑是我方推動兩岸學術交流值得重視與發揮的資源。換言之，由於民間團體多為自發性的交流行為，且多無意識形態之限制，因此此類學術交流有助於雙方溝通與資源互補，並彌補政府部門從事兩岸交流之不足。然而，畢竟民間團體的資金與行政支持難以長期負荷。政府部門如何篩選具學術交流貢獻與執行重點政策之團體給予經費與行政支援，並規避不必要的政治干預與導向，則有助交流功能進一步發揮。

兩岸學術交流與良性互動並非單方面的努力足以實現。事實上，儘管一方有誠意促進雙方學術交流與合作之擴大，但是在另一方互信不足與泛政治化運作下亦難以跨越學術交流之障礙。換言之，兩岸關係互動與進展勢將對兩岸學術交流進程產生實質影響；兩岸學術交流亦不可能排除政治因素而順利進行。因此，兩岸政治地位的釐清、統獨爭議的消弭，將有助於擴展兩岸學術合作與交流的視野與格局。

2000年總統大選陳水扁擔任國家領導人，使原已脆弱的兩岸互信

基礎更不易鞏固；即使一方積極釋放善意，亦終將因信任差距缺口偏大而難以發揮實質功能。事實上，在當前兩岸政治格局下，建立雙方互信，以及互信的鞏固應遠較善意釋放更為迫切與重要。換言之，也唯有互信的積累與建構才可能揮發「善意」的政治效應。此外，新政府亦不應將中共政策之底線與依賴美國保障安全做主觀的判斷，亦不宜因「大陸研究」學門成員具大中國思想傾向而否定其研究專業。任何中共容忍底線的誤判與觸動，皆可能導致民族悲劇。

由於新政府在兩岸關係互動中缺乏互信基礎，且犯錯的空間有限。因此，如何避免兩岸誤判、增進相互了解溝通，實為重要課題。無疑的，強化兩岸「智庫」與學術交流管道、提升學術交流的品質與秩序，並整合「大陸研究學門」的專業能力，對當前敏感、嚴峻的兩岸關係發展具有必要性與功能性。尤其是新政府如何在政黨理念與政治現實中尋求大陸政策的平衡點；如何在兩岸談判管道中斷的背景，延續涉臺體系交流與對話的機制，以及發揮學術交流管道之「界面」作用，應有助於紓緩兩岸緊張態勢。

（收件：2000 年 10 月 8 日，修正：2000 年 12 月 15 日，採用：2001 年 1 月 5 日）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 Policy: Operation and Assessment

Te-sheng Chen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in-chun Chen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t Taipe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views of Taiwan's Mainland China affairs experts regarding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 Academic flow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have been worthwhile because they have improved mutual understanding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scholar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Such flows have also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The current obstacles to academic exchange derived from political interference, bureaucracy, and mutual skepticism. However, isolation and suspicion could only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 and heightened instability. To improve the present condition requires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We are convinced that increased academic exchanges, particularly those centered on interaction among scholars within the same field and dialogues between government think-tanks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will enhance mutual trust and create a better political atmosphere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Keywords: Academic exchange; Non-probability sampling; bureaucracy; two-community; Strategic management